

往事钩沉

王辉

# 在大宁堂实习

1978年后,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,太原市的经济形势如种子发芽般破土而出,到处焕发着生机。地处迎泽桥西的前北屯村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尝试,全村人在村委带领下陆续创办起旅馆、汽修厂、澡堂、商店等一系列集体企业,一派繁荣景象,但村里缺医少药的状况一时还难以改变,有心创办一所大药房,可惜村里独缺这方面的人才,这一计划就暂时搁置下来。

一直到了1983年,正值风华正茂的父亲从山西中山中医专科学校毕业。担任村领导的爷爷大喜过望,很快在村里组织挑选了几个有志在医药行业发展的青年,男男女女总共7个,由父亲和一位年岁最长、有过赤脚医生经历的牛大夫带队,派到太原城里名声赫赫的大宁堂药店,进行为期6个月的实习培训。

大宁堂位于按司街西口17号,门口铺设着厚厚的大青砖,大门上方是鼎鼎大名的傅山先生亲笔题写的“大宁堂”牌匾。一进门,屋顶高耸,高大的木制柜架柜顺墙排列,尽显大店气势。墙壁上那首“不学韩康隐市中,好将妙药学雷公”的诗句道出了傅山先生济世救人的仁心,也成了大宁堂立店数百年来灵魂。这给当时正年轻的父亲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大宁堂前店后厂,大家去了后穿统一的蓝大褂工作服,在店里熟悉中草药,抓药拉屉,在厂里学习药材的加工炮制。一位面相干瘦、讲一口纯正太原

话的老药工负责指导这批新人。这位老师傅在大宁堂有几十年的工作经历,别看当时已86岁高龄,但工作中精神抖擞,一丝不苟,时刻在加工药材和按方抓药的各个环节上对这批新人严格要求,没有丝毫马虎。小到如何使用药碾,怎么使用药秤等等,都耐心地教导指正。

大宁堂对抓药环节的要求尤其谨慎细微,不仅是按方抓药那么简单,药抓完后必另有一人来查验复检,核对药材和方子是否一致。包药也有规范要求,草纸包的药包要直棱正角,不漏不撒。这样不怕繁琐的工作要求不光是培养员工端正的工作态度,更是对病家的高度负责,在父亲记忆中就有着这么一件事——

去实习的7人中,岁数最大的牛大夫虽做过赤脚医生,但毕竟未经过正规医药学校培训,偶尔也会粗心大意。一天,来了一位衣着朴素的老汉,说着一口浓重的晋源话,字里行间的发音还有些含糊不清。他拿着一张方子让牛大夫给他抓药。牛大夫三下五除二地把药配齐,到了复检环节,由父亲来负责。他一眼看出抓好的药中有一味药材并没有出现在药方中,通过给病人察言观色,又按方推断,此人必是中风症状。而牛大夫所抓的那味药材虽名称与方上所写相似,但药性大有区别。父亲赶忙把正待叠包捆绳的草药拿起撤下柜台,重新拿几张包药纸放到了柜台上按方抓药。待再次确认无误后,这才边捆扎药包边跟柜台内外一头雾水的人解释清楚缘由。老



汉知道原委后十分感激,用浓重的晋源话说道:多亏你了后生,要不然吃了闹大麻烦了!

就这样,在实习阶段,父亲在大宁堂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抓药制药的技术和知识,虽身处繁华闹市的钟楼街,也很少外出闲逛。

在大宁堂半年实习期满后,7个人陆续通过结业考核,拿到太原大宁堂统一颁发的实习合格证书。在实习期间,由傅山先生亲订的大宁堂堂训“方剂所设务求其验,药料所采务求真,后堂所修务求其精,丸散所成务求其用”深深刻在他们心里。

次年正月,在迎泽西大街桥西旅馆旁,桥西药店开业了。工作团队以这批实习人员为药店的骨干力量,父亲担任了药店的副经理。桥西药店在当时是河西地区少有规模的大药房,店内药材齐全,工作态度认真,深受附近居民好评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桥西药店因城中村开发而被停业拆除。时至今日,还有上岁数的老人回忆起从前的桥西药店时忍不住赞叹:咱们原来的桥西药店在那时可真算得上河西的“大宁堂”了!

难忘时刻

阿奇

## “三班倒”的日子

在太原化工厂工作的几十年间,我最难忘的是“三班倒”,就是在一线生产工段当工人,实行早8点白班、下午4点班、夜里零点班8小时轮班倒,每三天轮一次,最后一个零点下班可以休息56个小时。

太原化工厂是1953年至1957年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建我国的156项工程之一。当时,太原被列为国家建设的重点城市之一,156个项目中,共有11个项目在太原落地。其中有4个国家重点项目选址在太原汾河以西、吕梁山脉东麓,南起罗城,北至沙沟村之间,在此形成了我国重要的化工基地。当时,化工厂等企业的生活区设在了距太原市城区约15公里处的河西“义井”。

我们倒班要半夜从义井赶往化工厂,3至5公里的路上黑灯瞎火的,有时还要顶风冒雪,确实辛苦,但是一进入厂区,宽敞的林荫道,明亮的路灯,宽大的厂房、高耸的塔架,如同进入了不夜城,显得十分气派。

在化工厂上班一说“三班倒”,人们都比较发怵。化工生产高温、高压、气味重、环境差,连续夜班,还不能打瞌睡,确实比较折磨人。好在我所在倒班岗位是蒸馏工段,属于化工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,比较干净轻松。我刚上班的时候才18岁,精力旺盛,经常连续几个夜班不睡觉,一本小说做伴,一看就是一个班。有时候遇到放料,需要到几百米外荒野里的储罐开阀门,有的人害怕不敢去,我不怕,裹着棉袄、抱着小说,就着一盏昏黄的孤灯,一边放料一边看小说,直到物料放完才回来。

每到最后一个夜班,工友李师傅就要趁着休息56个小时回交城的家,天刚蒙蒙亮,他就会把设备工艺处理得井井有条,提前赶往交城,他那二八自行车上总是挂满了肉、醋等食品。据说,他要骑车4个小时才能到交城农村的家,等56个小时后的下午四点半,李师傅又准点出现在岗位上。“三班倒”对李师傅来说是最好不过的工作生活方式了,家庭工作两不误。

乡土记忆

## 干饼——舌尖上的美好记忆

郝妙海

在山西,有好多地方加工食用一种在石子上烤制出来的饼。不过,有的地方直接利用加工方法命名,就叫“石子饼”。有的地方则因饼的表面布满小坑,形象地称之为“疤饼”。在我们晋源一带,则因其含水量极少而叫它为“干饼”。

干饼的加工过程十分奇特,在我们这儿,管这个加工过程叫作“打干饼”。打干饼用的“石子”,是在西山冶峪村的瓷窑上专门烧制的,个头如酸枣般大小,乡民们称其为“炉子儿”,一套大约需十来斤才够用。炉子儿,只有在冶峪窑上有关系的人家才能弄到。因我奶奶是冶峪村的,而奶奶的一个侄儿就在窑上当大师傅,所以我家有一套炉子儿。打干饼,需用一种厚实的口阔且底子平缓的双耳铤儿。用大火,将铤儿及铤儿内的炉子儿烤红后,挖出一半炉子儿放到另外的锅里。剩下的摊匀了,迅速将已摊好的直径约一尺左右的发面薄饼摊于锅内炉子儿上,再将挖出的炉子儿倒回去,均匀覆盖在上面。上下高温烘烤,夹在炉子儿中间的薄饼很快就被烤干、烤黄、烤熟,烤出一股股麦香来,烤出一张双面布满小坑的干饼来。刚出铤的干饼,余温未退,绵软劲道,越嚼越香。待冷却后,则变得干、脆,咬到口中,咯嘣作响,需有好牙口才能直接享用了。

直到改革开放之前,干饼在我们这儿都是坐月子妇女的专用食品。谁家有了媳妇要坐月子了,就会借一套炉子儿回来,打一摞干饼备用。而有谁家姑娘生了孩子,孩子做满月时,娘家人携带的礼物中必定也有干饼。由于干饼极耐贮存,且用菜焗一下,或直接泡在稀饭中都十分可口,又易消化。一个月子里,干饼几乎是每餐必备了。而其他,或许只有年幼的孩子,会沾母亲的光,偶尔能吃上一块解解馋。

改革开放以后,这种石子上烤出的美食,方得以走上百姓日常的餐桌,也成了我其后十几年中每日早餐中牛奶的最佳搭配。家中保存的一套炉子儿,更成了街坊邻居青睐的宝贝,常常几个月在外“游荡”。待自己要用时,还得四处“追踪”才能找回来。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,精明的主妇们在和面时多加点油,多打几颗鸡蛋,再抓些糖或抓点盐,或抓把芝麻……烤出的干饼,更加酥脆,也更加香甜了。

然而,时代的发展真是太快了。当烧煤火变成燃气灶以后,干饼便打不成了。耳子铤,也被一些时兴的灶具所取代,早不复存在了。还好,干饼如今市场有售。但吃过后,觉着远不如自己家打下的香,所以很少买了。

岁月留痕

## 儿时过冬的穿戴

杨晋龙

上世纪50年代的冬天,真冷。雪多,整个冬季一片冰天雪地,刺骨的寒风呼呼直往脖子里灌。那时我上小学,脚后跟、手指上常常冻得裂开几道口子,母亲用卫生胶布,给我一道道贴。上学或外出时,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,一双窝头棉布鞋,一双棉袜或毛线袜,一条宽松的棉裤,使劲一折叠,用一条结实的布带,当作裤带系紧,上厕所时,挎在脖子上防止滑落到地上。男式上衣一般是布条对襟襟扣子的中式棉袄,女式是左侧对襟襟扣子。有条件的,棉衣外套一单布衣罩,脏了只洗衣罩即可。棉帽是必需的,而且还连有两扇耳罩,也有人戴着毛线织成的耳罩,脖子上人人围着一圈围巾,有毛线织成的、棉布的、绒线的、颜色倒不单调。手上戴着大拇指和四指分开

的棉布和毛线手套,中间系一绳挎在脖子上。没有手套的,双手塞在袖筒里,虽很寒碜,却很暖和。三九极冷天气,有时也加绒衣绒裤或毛衣毛裤,那时戴口罩的主要作用是防寒。

严寒的冬季,造就了祖母、母亲们织毛衣、缝棉衣的一手精巧手艺,我的一身棉衣就是奶奶一针一线缝出来的,我的毛衣是母亲日以继夜一针针编织出来的。由于那时国家经济建设尚处恢复时期,受各种条件局限,老人、大人、小孩穿戴基本都是这样,难讲究样式、美观,而且每人只有一套这样过冬的穿戴,没有替换。

几十年过去了,如今的男女老少穿着轻盈美观的各色各样防寒衣裤,当年那些过冬的衣物已渐渐被人淡忘了。

